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研究成果

中国 民族史研究

论稿

王文光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研究成果

中国民族史研究论稿

王文光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民族史研究论稿/王文光著. —昆明: 云南
大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 - 7 - 5482 - 1586 - 8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华民族—民族历史—
文集 IV. ①K2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1644 号

中国民族史研究论稿

王文光 著

策划编辑: 赵红梅
责任编辑: 石 可
封面设计: 刘文娟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63 千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2 - 1586 - 8
定 价: 38.00 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电 话: 0871 - 65031071 6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 - mail: market@ynup.com

目 录

中国民族史学史研究

中国民族史学发展述论	3
司马迁的民族史研究及其对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的贡献	12
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及民族史学科的发展	20
论梁启超早期的中国边疆民族史研究	31
论梁启超晚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	41
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及其对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贡献	56

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

《史记》“四裔传”与秦汉时期的边疆民族史研究	67
《史记·匈奴列传》与匈奴社会 ——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	76
从《史记·大宛列传》看汉王朝对西北民族的治理及对中亚、 南亚民族的认识	84
中国西南古代氐羌民族的融合与分化规律探析	93
试论明朝对西南边疆乌蒙等部的治理及其政治博弈关系	99
清代中央政府与西南民族上层的政治博弈	111

中国古代的土兵研究

中国边疆的土兵研究	123
中国西南边疆的土兵浅述	136
明代土兵述论	144
清代西部边疆土兵的发展与衰亡	151

云南的民族识别研究

当代云南民族识别学术回顾	161
1950 年以前对云南民族的识别与分类	171
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民族识别的认识与反思	180
当代云南彝族识别的回顾与反思	190
利益、权利与民族认同 ——对白族民族认同问题的民族学考察	198

民族文化研究

傣族的饮食习俗及其文化功能	207
傣族的农耕过程和农耕礼仪	215
后 记	223

中国民族史学史研究

中国民族史学发展述论

从宏观上讲，中国民族史学的任务是阐述中国民族史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分析中国民族史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及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对中国民族史研究做出评价。从具体的内容而言，中国民族史研究可以分为在古代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古代民族史研究、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近现代中国民族史研究。本文力图按照历史发展的纵向对中国民族史学的历史过程做一个发展评述。



对中国民族史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古代对中国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商代，在甲骨文、金文文献中就已经有了对氐、羌等民族的零星记载，先秦时期的《诗经》《尚书》《春秋》《国语》等古籍中到处散见对古代中国民族群体的记载，在《夏书·禹贡》中还记载了最早的民族政策“五服制”。尽管先秦时期的民族历史记述零散简要，常常是只言片语，一带而过，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但作为民族史研究的发端，它如实展现了当时存在的民族群体类别，战与和交互运动中不断融合的民族关系，为民族史研究提供最早期的基本史料。

二十五史中司马迁首创了“四裔传”，开创了较为系统研究华夏族和汉族以外的民族历史的先河。《史记》通过“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和“朝鲜列传”分别记述了中国东南西北四方的少数民族概况。这种按地域来分别为少数民族立传的做法开创了中国民族史记述的先河，从民族史学科研究的角度而言，司马迁的《史记》“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有了明确的研究时空概念、明确的研究对象和丰富的研究内容，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以司马迁作为起点”^①。后世的史学家基本都是仿照司马迁开创的这一模式来进行民族史的记述。

^① 王文光、张媚玲：《司马迁的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载《学术探索》2008年第6期。

《汉书》与《史记》相比较有了变化。由于整个汉代的民族关系重点是北方和西部，而整个汉王朝的东南方、西南方绝大部分地区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之下，所以《汉书》把《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合并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而把《大宛列传》变为《西域传上下》，关于匈奴也改变为《匈奴传上下》，这个变化比《史记》更加明确了当时汉王朝民族关系、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在。

《后汉书》在《汉书》的基础上有了更加大的变化：第一，没有了《朝鲜列传》但是却增加了《东夷列传》，内容涉及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民族，第一次记载了许多前代没有的民族；第二，第一次记载黄河中上游的民族和在匈奴变化之后的北方民族，写出了《西羌传》和《乌桓鲜卑传》，与前代的文献相比，对于羌人、乌桓鲜卑的记载则更加具体；第三，出现了《南蛮西南夷传》，把西部、西南、中南的民族全部集中到一个传，说明统一多民族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民族有了更加深入的治理；第四，由于匈奴的融合与分化，所以原来的《匈奴列传》变为《南匈奴传》；第五，东汉王朝对西域的开发仍然在深入，所以保留了《西域传》。这些变化实际上是反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内外民族关系的变化，反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的分化与融合，反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对辖区内各民族治理的不断深入。

《三国志》中专门的民族史仅见《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蜀书》《吴书》中虽无专门的民族专传，但关于氏羌、山越民族的记载散见于《诸葛亮传》等各传中。

《晋书》专设了《四夷传》记载四方民族概况，还首创了“载记”这一综合了本纪、列传、志的体例来记述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领及其所建立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发展全貌。

《宋书》中关于民族史的记载包含《索虏传》《鲜卑吐谷浑传》《夷蛮传》和《氏胡传》。

《南齐书》设《魏虏列传》《蛮、东南夷列传》和《芮芮虏、河南（匈奴）、氏、羌》三传来叙述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荆、湘等地的南方民族、北方和西北的民族发展情况。

《梁书》在《诸夷》中记载了海南、东夷、西北诸戎的历史。

由于陈朝历史短，所以在《陈书》没有民族专传，民族历史的情况散见于各相关列传之中。

《魏书》的民族史研究侧重于西域民族、北方民族、东北民族。

《北齐书》没有少数民族的专传，对民族史的记述散见于各传，反映了当时的各民族间相互征战、遣使朝贡的民族关系。

《周书》将少数民族传记归入全书最后的《异域传上下》，在《异域传上下》中首次出现了突厥、稽胡的记载。

《北史》侧重鲜卑、匈奴、西域等北方和西北民族的记载，具体有列传八十二记载东北亚地区的民族、列传八十三记载南方民族、列传八十四记载西部的民族、列传八十五为《西域传》、列传八十六记载北方的民族、列传八十七为《突厥、铁勒传》。

《南史》有《夷貊传》对东北亚、东南亚、南方民族历史的记载更为翔实。

《隋书》的民族史记述按方位分为“东夷传”“南蛮传”“西域传”和“北狄传”。

《旧唐书》一共有《突厥传》《回纥传》《吐蕃传》《南蛮西南蛮传》《西戎传》《东夷传》《北狄传》来记述少数民族史事。但《旧唐书》表现出重北轻南的倾向，所以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不多。

《新唐书》在《旧唐书》的基础上增加了《沙陀传》，《南蛮传》中专设《南诏传》，因此史料更为丰富，记述更为详尽。

《旧五代史》中将各少数民族史事放入《外国传》二卷中。以中原纪年为纲，记述了周边十二个少数民族的主要史实。

《新五代史》将少数民族的记载放在《四夷附录》中，分为《四夷附录一契丹》《四夷附录二契丹》《四夷附录三其他相关民族》，重点记述契丹、吐谷浑、吐蕃等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对东北、西南民族的记载则很单薄。^①

《宋史》共有《外国传》八、《蛮夷传》四，分别记述独立的民族政权和纳入宋王朝的政治势力的民族。

《辽史》全面记载了契丹历史，《二国外记》中只记载了契丹东边的高丽和西边的西夏。此外，《辽史》大量运用《游幸》《部族》《属国》等表达方式展现民族关系。《国语解》则保留了契丹语的民族史宝贵资料。

《金史》是研究女真族最重要的文献，《外国传》分别记述西夏和高丽向女真称臣的史事。

元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故《元史》没有用专门的少数民族列传的方式来记录各民族的情况，而是在《地理志》中分别记录了各省民族的情况，这是第一次十分系统地按行省、路、府、州、县这种行政系统来研究民

^①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是宋以后唯一被列入正史的一部私撰史著，与官修史书相比，不必受到种种约束，可以自由表达更多的个人观点，故在内容和形式上更好继承司马迁的民族史修撰特色。

族历史，意义十分重大，表明元朝中央政府的统治已经能够深入县了。《元史》中记录最详细的是蒙古族史，周边邻国及其民族的历史研究放到《外夷传》中。

《明史》首创了《土司传》来叙述明朝各地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外国传》记载境外民族历史，其中有许多非外国的民族，而是明王朝政治上的对手，如瓦剌等。再加上《西域传》，可以说《明史》中的民族记载在二十五史中分量最多。

《清史稿》在体例上多同于《明史》，同样无民族专传，用《土司传》来记录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的民族情况。凡归理藩院管理的内蒙古、外蒙古、青海、西藏的民族则归入《藩部列传》中。《清史稿》中没有《外国传》，而把有比较紧密政治隶属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归到一起，写入《属国传》。

由于《史记》之外的正史都是后朝人所修，都有为当朝帝王总结前代灭亡教训、为制定政策提供资政的修纂目的，因此史官们通常是重点着眼于政治，所以中央王朝对各民族的政治统治成了主要内容，民族之间或以战争形式，或以朝贡关系表现出来的民族关系便成了重点内容，而对文化的记载则是不足的。对此，《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曾说：“夷狄兴灭不常，是皆乌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来，能为中国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①即史官对民族历史的关注，是以民族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否密切来决定的。

此外，由于中国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南方为农耕经济、北方是游牧经济，所以历代王朝与北方民族的或战或和的民族关系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史中就出现了重北轻南的特点，《元史》以前的大部分正史中都有关于北方民族详细的记载，但对南方民族的关注便依势而定。于是如《陈书》《南齐书》等正史中对民族历史的研究相当薄弱，没有关于各民族历史的专传。^②

元明清三代虽然有王朝的更迭，但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已经奠定，今天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都已在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中央政府与各少数民族地区形成稳固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所以在正史中重北轻南的现象开始改变。特别是《元史》中的地理传，《明史》首创的《土司传》，《清史稿》中的《土司传》《藩部列传》，都是按每一行政大区之下的路、府、州、县或相关行政管理机构来研究少数民族历史，这就较以往正史能够更为

^①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华书局标点本 1974 年版，第 885 页。

^② 当然，这与陈朝、南齐的历史短暂有关。

系统地开展对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

综上所述,二十五史中对中国古代民族史的记述有以下几个特点:^①

第一,古代中国民族史研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以政治的视角为出发点。首先,中国古代的民族史研究内容偏重政治治理、民族的政治关系、民族战争等,忽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其次,除了司马迁的《史记》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外,二十五史几乎都是官修史书,所以记述历史有诸多顾忌,多用曲笔。再次,政局平稳时对民族史的记述就详细,而动荡时期则民族史记述简略。随着政治上的大一统加强,历代民族史的研究呈现从少到多、从简到详的趋势,而且对民族历史研究的深入与国家对各民族统治深入与否有关。

第二,中国古代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具有强烈的大民族主义,表现为“内华夏,外夷狄;贵华夏,贱四夷”的民族史观,所以对民族史的记述一般都放在全书的最末,而且把汉族和汉文化作为评价是非的标准,记载上不仅厚此薄彼,还对少数民族有很多民族歧视和民族偏见。

第三,虽然古代中国民族史研究客观上为今天认识中国各民族和周边国家民族留下了宝贵的原始资料,但是史书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史书修于政治稳定时期,历时久远,汇集众多学者之力,故史料丰富可信,剪裁合理,有的则编修于历史混乱时代,仓促完成,故难免有重复疏漏、繁杂之嫌,如《旧唐书》。有的还是辑本,如《旧五代史》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对民族关系的记载依据辑录者的大民族主义观进行了大量删改,难以真实再现当时的民族情况。其次,由于古代中国民族关系的重点在北方,所以在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就表现出重北轻南的倾向,北方民族历史的记载和研究的详尽程度远远超过南方民族。

通过以上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民族史研究有两点值得充分肯定:

第一,再现了中国民族发展的基本历史过程。中国民族史研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代关于中国民族史的记载和研究有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对中国古代民族历史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的学术文化传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① 当然,在官家编纂或私人著述的各种类书、丛书、方志、游记、笔记中,也有大量关于民族的记载,较为重要的如常璩的《华阳国志》和樊绰的《蛮书》,这些文献大多是记载了作者亲历的民族史事,真实性较高,弥补了正史中忽略的许多地方民族情况,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第二,古代中国民族史研究始终围绕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展开,是中国国家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反映了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从民族众多走向融合、统一的历史过程。

总的来说,古代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还处于自发的、不自觉的阶段。

二

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史研究是在近代中国的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背景下展开,因而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逐步向现代学科发展的时期。

面对内忧外患,在亡国灭族的民族危机下,同时受到西方民族学的影响,大批学者开始关注民族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梁启超先后撰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等一系列文章,探讨了民族的概念、民族史研究的意义和方法,为民族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梁启超及王国维、顾颉刚等学者的推动下,中国学术界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民族史研究热潮,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出版了一批全局性、综合性的民族史著作。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以汉族的发展蜕化为主线展现了中国多民族的发展历史,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是各民族的混合体,应相互团结。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对中国的12个族群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详尽的考证,是一部各民族发展简史。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分析了汉、满、蒙、回、藏、南方民族的古代和现代发展概况,着重介绍各族间相互帮助、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是民国时期民族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从横的方面探讨了中国民族的分类,从纵的方面探寻了各民族的发展历史,并对民族史的性质、研究范围、对象、内容等理论问题也第一次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显示了其不同于其他研究者的学科意识。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首次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平等的民族史观来进行民族史研究。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则借助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统计学、牒谱学、田野调查等多学科方法和资料探寻各民族的渊源,拓展了民族史研究方法。

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与古代相比有了巨大进步和根本性的变化,可以从下面几点看出:

第一,在构建中国民族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史的研究由古代的“自发”转变为“自觉”的研究。学者们的民族史观虽然还残存大民族主义和民族歧视,但已开始重视民族平等。学者们不再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不再侧重于政治统治,而是站在国家和中华民族发展的高度进行学术研究。研究

中国民族史，目的在于唤醒民众、团结一致构建民族国家。故每本《中国民族史》著作均强调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体现了史学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研究特点，反映了史学家强烈的社会责任和时代精神。

第二，中国民族史学开始向具有现代意义的、研究内容丰富的学科发展。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摆脱了附属于传统政治史的地位，开始有了明确的学科定位。学者们开始探讨中国民族史的性质、意义、研究内容、方法等一系列核心问题，构建了包括民族起源、民族融合、各民族共同构建统一国家、南北民族差异等内容在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基本理论体系。

第三，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中国民族史专著，使中国民族史研究在学术范式、深度、广度上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奠定了下一个历史时期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坚实基础。由于研究者都是具备深厚国学基础的饱学之士或是留学西方的广博学者，所以对古代民族史资料给予了非常充分而细致的研究，同时也开始借鉴西方学术观点和方法，因此研究质量较高。如果说古代的民族史研究仅仅是在王朝史中开辟专章来记述民族发展历史，相对简略，系统性欠佳，民国时期的几本中国民族史代表性著作则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视角详细分析了中国各民族的发展历史，学术水平更上了一个新台阶。研究的民族也由最初的“五族共和”扩展到了分布于各地的少数民族，研究领域已开始超越旧有的族源、政治斗争、民族关系等范围，向经济、文化等领域渗透，研究更加专门化，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族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四，受国外民族学、人类学等研究影响深远。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在研究方法、实地调查、参考文献等各方面都借鉴了西方学术成果，不再单纯停留在中国传统史学体系依赖文献考据进行研究，具备了现代意义的民族研究理论和研究范式。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民族史研究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弄清国内的民族情况，制定合理的民族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工作。通过这些工作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民族调查资料，形成了一系列调查报告和民族简史简志，中国各民族第一次对自己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历史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此外，学术界还就汉民族形成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主流、民族与疆域、民族战争与民族英雄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推动了民族史理论

的深入发展。

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民族史的学术研究受制于各种政治运动，基本处于停滞阶段，学科发展、研究方向、方法、民族观上都受到负面影响。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了大批民族史著作和论文。涵盖了中华民族通史、民族关系史、民族政治史、民族文化史、民族经济史、民族宗教史、民族思想史、地方民族史等，专著数百种，论文数万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比民国时期的民族史著作的粗疏简略，这些著作研究领域更加宽广，论述分析更加深入，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与古代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民族平等观为指导，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下来进行中国民族史研究。但是，因为历史和地域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的发展普遍滞后于汉族的发展，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贯彻民族平等，促进民族团结的精神，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重点倾向于少数民族研究，但一度走入另一极端，以至于出现民族史研究等同于少数民族研究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后，学术界已达成共识：要重视汉族研究，汉族和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都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同时重视汉族和少数民族研究，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才是完整的。

第二，中国民族史研究从自发、自觉上升到积极主动、有组织的研究。民族史研究不仅仅是学者个人的学术爱好，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政治稳定的需要，中国民族史研究呈现紧扣时代的重大事件有计划地展开。正因为如此，当代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例如民族识别、民族调查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当代中国民族史研究，故规模之大世界罕见，国家的高度重视、学者的优势互补，提高了民族调查的效果，但学术自由和求真务实也不可避免受到行政干预的影响。

第三，研究内容丰富多彩，涵盖面扩大，表现出视角开阔，新论迭出的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是在明确的学科定位、长远的学科规划下，有一大批老中青学者积极参与，因此研究比较系统化，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远超出两个阶段。学者们注重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对民族史研究一直存在争议的很多问题进行了论辩，促进了理论的深化。研究方法上继承了古代和民国的传统，既注重史料的挖掘，又注意借鉴多学科和国外研究成果。同时也坚持理论与现实结合，很多研究成果对今天的民族工作起了积极的政策参考作用。

四

在对中国民族史研究进行历时性的回顾后，我们还有以下认识：

首先，按照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多元时间”法，我们认为中国相对独立的特殊地理位置、南北各异的生态环境、多民族的社会结构和大一统的思想传统等“长时段”因素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中国民族史的理论研究只有从长时段角度去探索，才能揭示中国民族发展的根本动因。例如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民族融合、民族迁徙等均和我国的地理和生态有密切联系。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中国民族史研究从古至今长盛不衰，任何政治群体或政权只有关注民族研究，才能在中国立足和发展，因此，不论经历了多少曲折险阻，对民族史的研究都没有中断，忽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是没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是没有学术生命力的。

其次，从由长时段因素所制约的经济、社会、国家政权更替和文化等“中时段”因素来看，中国南北经济类型的不同决定了民族史研究关注南北民族差异问题和应该要克服重北轻南的倾向。此外，中国民族史研究随国家、社会变动而变化，具体表现为政治清明、政局稳定时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就详细而深入，社会动荡时期则民族史记述简略，所以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是随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呈现出由少到多、由简到详的趋势。

再次，从政治变动、外交、战争、人物、立法等重大事件频繁变化的“短时段”因素来看，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和著者的民族史观，中国民族史的研究者始终把自己的研究和时政紧密联系，一些划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对中国民族史研究影响巨大。

司马迁的民族史研究及其对统一 多民族中国发展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中国各民族发展历史的研究是有传统的，但由于先秦时期的史料过于零碎，还谈不上有真正的民族史研究。真正的民族史研究始于中国史学的奠基人司马迁，他是对中国民族进行通史性研究的第一人，而且他写的一个列传往往就是一个地区多民族通史，或者是一部民族简史，从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角度看，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了“四裔传”，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有了明确的研究时空概念、明确的研究对象和丰富的研究内容，从而开启了中国民族史研究。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角度看，司马迁的贡献更大，他建立了中国民族发展的整体观，在整体观的指导下把对每个民族的研究都放到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宏观历史背景下来展开，同时在研究中还表达了“华夷共祖”的思想，这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一、司马迁民族史研究的对象与内容

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要有明确的学科研究对象，对象是研究的主体和核心，一切研究都是围绕着对象而展开和进行的。司马迁的“四裔传”就有十分明确的研究对象，虽然还不能说司马迁在当时就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意识，但他确实将华夏族、汉族以及所有和华夏族、汉族发生联系的各民族都作为研究对象，这在客观上使中国民族史研究一开始就具有了学科的意味和科学的性质。

在《史记》中与民族有关的《西南夷列传》《匈奴列传》《东越列传》《南越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六个传记中，司马迁把汉族以外的周边各少数民族及相关代表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值得说明的是在先秦文献中多次提到的三苗、百越、徐戎、淮夷、莱夷等民族，在司马迁的民族传记中基本没有出现，其原因大约有以下三点：

第一，先秦文献中提到的一些民族已经在华夏化的过程中融入华夏族，如徐戎、淮夷、莱夷等民族就已经融入华夏族。